

展望高教“十四五”系列②

高教毛入学率达六成意味着什么

■本报记者 陈彬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而言,10%的增量意味着什么?

在不久前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我国正式提出,“十四五”期间国内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要提高到60%。

1973年,美国教育学者马丁·特罗首次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三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精英化、大众化和普及化,其具体区分指标则分别是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小于15%、15%~50%,以及大于50%。

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19年就首次超过50%,正式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规模的持续扩大在为广大受教育群体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高等教育质量及“内卷化”忧虑。

60%的毛入学率目标,意味着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还将持续扩大。如何趋利避害?当这一目标完成,我们的高等教育将呈现怎样的面貌?

当“预警”变成“目标”

所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指某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与适龄人口(我国指18~22岁年龄段人口数)之间的比例,比例越高则说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越高。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首次超过15%,进入大众化阶段。此后,我国仅用18年时间,便完成了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过渡。这一速度超过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

“简单地说,这是供需关系所决定的。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规模为高等教育提供了庞大的供给能力;另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产生了对人才的巨大需求。”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赵庆年说。另外,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到普及化的跨越。

“一般而言,西方国家实现这一跨越都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问。”赵庆年说。

据统计,1998年我国高等教育总招生人数为108万人,至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增加至540万人,增长了5倍,在校总人数达到2500万人。而到2019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已达到了4002万人。

对此,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战略发展部副主任刘承波指出,马丁·特罗理论是以欧美高校的大众化发展为样本和参考提出的,本身有着一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的过程同时受政府、市场和学术力量的影响,但在不同国家,这三者的力量对比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受市场影响比较大,而我国政府的推动力量相对而言要更大一些。”刘承波说,这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事实上,马丁·特罗的大众化理论主要关注的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高等教育规模在扩张到一定程度后,其高等教育系统可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有所准备的。“从这个角度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更像是一种带有前瞻性的“预警理论”。”赵庆年说,而我们似乎更多地将其作为了一种“发展目标”。

对于这一目标思维所产生的结果,他表示,西方一些国家高等教育规模的提升,主要是通过新建高等学校实现的。这种方式前期投入更大,见效也比较慢,但可以更好地保障原有高校的教育质量。相较之下,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早期高等教育的扩充则更多地通过高校扩大办学规模实现。这种方式前期投入低,见效快,更有利于目标的达成,但副作用是会导致原有高校生均教育资源下降,影响高等教育质量。

尽管如此,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我国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深层次动力。

重点在调结构

根据今年3月初教育部网站公布的消息,截至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54.4%。在采访中,对于“十四五”规划中所规定的60%的目标,几乎所有受访专家都认为实现的难度不大。甚至有专家指出,设定这样的指标并无太大必要,尤其是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已经很大的今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过快提升,反而可能会消耗更多的社会资源。

对此,赵庆年有着自己的一番理解。“我认同60%目标在‘十四五’期间实现几乎不存在问题。事实上,从我国目前人才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上看,毛入学率是50%还是60%,本身意义并不大,而且在高等教育进入到普及化阶段后,规模增加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效益也不像之前那样明显了。”他说。

即便如此,赵庆年依然赞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进一步提升。“提升毛入学率将导致高等教育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而这些扩大的量作为高等教育增量,将有助于进一步优化高等教育现有结构。”

近年来,有关部门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种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十四五”规划中,提出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要提升至60%,规模的持续扩大,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达上千万的学生增量,是否可以优化现有的高等教育结构?精英教育理念的回归能否与提升弱势群体受教育质量达成平衡?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时期,高等教育与社会之间又该如何调整彼此关系?

方式,优化各层次和类型的教育形式在高教领域的布局。比如,在研究生教育中大力提倡专业硕士,以及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扶持。而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实例,便是我国于2014年前后开展的600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职业教育类型转变的工作。这项工作提出时曾引起巨大关注,但最终效果并不明显。

“这是因为这种转型只是在存量中进行调整,而这种调整的难度是非常大的,但如果我们能够利用好未来的增量,则可能在不触及存量利益的情况下,优化目前的高等教育结构。”赵庆年表示,这也是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摆脱单纯数字指标的一条路径。

但只要走上这条路径,依然需要面对一个问题——对于我国来说,最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应该是怎样的?

此前,刘承波和同事们曾针对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中各层次的比例关系进行过研究。他表示,目前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有着不同特点,比如有些国家缺少专科层次教育,但其普遍存在的一个共同点是本科层次教育占比最大。

“总体而言,各国在普及化阶段,各层次高等教育分布趋于稳定,并彼此保持合理张力,这是我们需要借鉴的。”他表示,但要形成普及化阶段合理的高等教育层次结构,除借鉴代表性国家高等教育层次结构特征外,还须结合我国国情及未来产业升级要求来进行调整,“这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公平性的挑战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长期关注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在他看来,在普及化阶段,无论高等教育的增量如何适应产业结构变化,有一点是必须坚持的,那就是未来毛入学率的增长一定要体现在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状况的改善上。

“比如农村地区人口、残疾人、少数民族地区和偏远地区人口,怎样才能让这些人口上得了大学、上得起大学?这就是高等教育普及化要努力提升的所谓‘结构性质量’。”别敦荣说。

在研究中,别敦荣将高等教育普及化时期细分为三个阶段,即初级阶段(毛入学率在50%~65%之间)、中级阶段(毛入学率在65%~80%之间),以及高级阶段(毛入学率达到80%及以上)。对于这三个阶段的特点,他做了以下概括——

在初级阶段,高等教育更多地满足中等阶层子弟的需求。弱势群体接受高等教育的覆盖面虽得到一定程度改善,但由于相关政策措施不配套,其依然面临较多障碍。在中级阶段,随着政策更加灵活,大学生经济资助政策不断完善,普及化高等教育生源的社会阶层分布越来越深入中下层子弟。至高级阶段,接受高等教育的各阶层学生都不再为经济、政策和社会文化所困。

显然,即使按高等教育毛入学率60%计算,“十四五”期间我国依然处于普及化初级阶段。换言之,如何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接受高

等教育的权利依然是最大挑战。

从国际经验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分配不公平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保中的一项研究,即使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也并不能降低基于家庭阶层地位的教育不平等。

“虽然大学扩招的确给弱势群体背景出身的子女带来了更多上大学机会,但并没有增加他们获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现实是越高等级的教育,获得的机会不平等的程度越大。”在一篇文章中,李保中表示,在规模不断扩大的趋势下,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公平状况呈现两种发展趋势:一是从数量角度看,高等教育机会获得越来越趋向于平等化;二是从质量角度看,优质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并未增加甚至变得更加不平等。

值得注意的是,受访时,有学者提到在高等教育的普及化阶段需要重塑“精英教育”理念。赵庆年便表示,在普及化阶段,精英教育在高层次人才培养中依然具有重要价值,然而在此前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大的过程中,我国的精英教育已经遭受严重冲击。“此前很多国内顶尖大学也在盲目扩招,甚至扩招幅度比一般高校更甚,现在看来可能导致了优质教育资源的稀释。”

对此,厦门大学教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郭大光也曾撰文指出,当前我国似乎已经跨过了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但由于国内高等教育历史较短,并没有形成或走向精英教育阶段之路。我国的精英教育阶段仅仅是从入学率角度而言的,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教育”。未来为避免人才培养出现学历“贬值”,高等教育需要重塑精英教育理念。

然而,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不足的当下,要想保持甚至提升精英教育质量,必然要牺牲一定的扩张规模,这是否又会加剧优质高等教育的不公平性?

谁来消化“增量”

在保持和提高精英教育质量的同时,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另一个难题则是如何为“增量”寻找足够的教育资源。

根据别敦荣的研究,目前我国尚处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初级阶段。而未来10年左右,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约65%,即进入普及化的中级阶段。按照我国高等教育当前的体量,如果达到65%的毛入学率,还应该会增加1000万人左右的高等教育规模。“也就是说,高校至少需要再多招收1000万名学生。”

这一增量比目前德国所有高校容纳学生总量的三倍还要多。

“问题是,目前我国高校的平均投入并不高,在办学资金没有大规模增长的情况下,现有高校的办学规模基本上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吸收新增学生数量的潜力不大。”别敦荣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意味着新增的1000万学生的求学需求,主要靠新建高校满足。

根据统计,目前国内本科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规模在1.5万人左右,高职院校的平均在校生规模为7000多人。即使按照本科与专科

新建高校1:1的比例计算,未来10年也需要新建超过900所高校。

“因此,筹措更多高等教育资源、兴建更多高校在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必须面对的课题。但是,目前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在资金的投入上基本已经倾尽全力,要想依靠公共资源和政府财政拨款消化如此大的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增量,已经变得很困难了。”别敦荣坦言,进一步开放社会资本,使民间资金能够较顺利地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已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在这方面,虽然我国对于民间资本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一直持欢迎态度,但对于我国营利性民办高校和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界限划分,直到2016年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才确立。即便如此,依然有诸如营利性高校的公益性如何实现,政府规范管理营利性高校的配套政策措施如何确定,已经上市的诸多民办高校在没有履行新的法人登记手续之前,是否能认为它们是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等问题没有很好地解决。

“必须承认,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虽然名曰‘促进’,但其中的某些措施对于民间资金的进入依然有所限制。这部法律要真正促进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还需要进行很多调整。”别敦荣说。

从培养“天之骄子”到劳动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规模日趋扩大的今天,“学历贬值”现象在我们周边变得越来越普遍。

以外卖行业为例,目前我国的外卖服务员高达700万人。而就在3月20日举行的2021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国内知名招聘网站“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透露,该平台收到的外卖员岗位求职简历中,有20%拥有本科以上学历。这在以前是很难想象的。对此也有人表示,这种“学历贬值”现象已经造成了社会人力资本的“内卷化”。

“现在看,我国高等教育在从大众化向普及化过渡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某些问题,比如大量专科生很难找到较高收入的工作,这使得他们实现价值增值变得非常困难。”赵庆年表示,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开始蔓延到普通地方本科了。

“这也是很多学生一味追逐高学历的重要原因。”他说,在人力资本的问题上,决定权并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也需要进行必要的调节。“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借鉴某些国外做法,为本科生和专科生设定一个合适的最低工资标准?”

在刘承波看来,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校毕业生不可避免地从“天之骄子”变为普通劳动者。“这是一个趋势,而高校和社会需要做的便是主动顺应这一趋势,对自身进行调整。”

具体而言,除了社会层面对此要抱有一份平常心外,更重要的是高校,尤其是占高等教育主体的普通高校,应将自身人才培养的重心,从培养“天之骄子”转变为培养社会需要的建设者、劳动者。“也就是说,高校的人才培养要更加结合社会需求。这点看似普通,但在目前国内高校,尤其是本科高校专业设置相对固定的状况下,想要做到并不容易。”

事实上,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在高等教育出现的初期,受教育者从事一项普通工作其实并不少见。比如在民国时期,便有大量优秀学者从事诸如小学教师等工作。而将学历高低与工作状态挂钩,反倒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值得深思。”别敦荣表示,高等教育本身是存在经济性和人文性两面的,高等教育早期,人们更关注的是其人文性的一面,看重的是对个人自身素质的提升。而当接受高等教育能够带来更丰厚经济价值的时候,其经济性的一面便愈加被人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产出一定要大于投入,否则便是‘亏本’了。”如果按照这一观点,本科生去做外卖小哥当然不划算。

然而,当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乃至普及化阶段,学生规模的增加使高等教育不能像此前那样为受教育者普遍带来高收益时,我们要做的不是刻意提升经济价值,而是反过来更加关注其人文性。“别敦荣表示,通过对受教育者自身素质的提升,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要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引领作用。”

至于何谓引领作用,别敦荣解释道,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不能简单地用“经济性”来看待,而应当更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也就是说,高等教育追求的并不是以现有岗位来容纳人口就业,而应当是在发展过程中,由受教育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发展更大规模和更高质量的经济,从而在高等教育和经济发展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

“这并不是什么理想化的状态,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发展就是这样走过来的。面向普及化阶段,我们更不能因为存在某些困难,便死死死住高等教育的发展,这将导致教育与经济的两败俱伤。发展更多、更好的高等教育,引领和带动经济社会的进步,这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无论任何时候,都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别敦荣说。

中国大学评论



尤小立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近日,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教育部将把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列入今年重点工作。就这一消息,对于正规的大学来说,应该是拍手称快的。因为自从被限制参与社会上的学历教育培训后,大学就与校外培训机构形成了对立。双方没有想象中的相互补充,而是操作上的暗自较劲。“对立”更多地表现在形式上,实质是大学也在强化自身的“培训功能”。这样看,双方又仿佛是在争夺18岁以上成年人的教育权。

其实,就培训而言,大学并非校外培训机构的对手。后者是学生(客户)要什么就教什么,不仅内容可以根据需要而即时设定,情感上也一样,要关怀、陪玩儿式的就极尽关怀和陪玩儿,要严厉就严厉得像旧式私塾先生或者包公——角色不重要,重要的是,完全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用俗话说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随意性”“灵活性”,大学并不具备。大学有预先订立的一整套教学计划和方案,有一个系统性的要求,而这些恰是大学科学性和育人功能的体现。

校外培训机构也不是不讲科学性,但它是完全实用的,是讲实用大于讲科学。它们也有宏大的口号,比如“为社会需要服务”“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过,它们钻的是“社会需要”的多元性以及“实际”本身模糊性的空子。

既然“社会需要”是多元的,就说明它有层次可分。就教育而言,作为高等学府的大学应该处于顶端,也就是说,大学即便是从“社会需要”考虑,也不能像培训机构一样,为迎合短期的社会需求而照单全收。大学的社会服务应该是以提供高端人才为主,兼顾原创性理论的构想和富于理论性技术的提供,以此体现时代文明的高度。

就概念上说,“实际”是指真实的情况,但在现实中,“实际”是可以被虚构的,所以它不一定等于“真”。培训机构就有虚构“实际”的本事。在他们那里,技巧高于内容,虚饰重于真实,总之是为“应试”“考级”“考证”“升学”可以不择手段,因而最缺少的是“真”,而“求真”是大学的固有功能,它不仅决定科学研究的水准,也最能体现大学对社会的贡献。

但过多地讲理论不免让人感觉迂阔,当下的大学在与培训机构竞争中也在受其影响。以实用视角看问题,以实用机制评价从业者的素养和水平就是其中之一。

“实用”背后的重要支撑就是生存原则。“生存”的确是人生的基础,但人们对“生存”的理解是不同的。有的人吃饱肚子叫生存,有的人住别墅、开豪车也叫生存,所以时下流行的“理想”是“财富自由”。但是,这一差别仿佛无人介意。因此,能看到的状况是,预算几百亿元的大学、几十亿或几千万元的大学的追求都在趋同,好像都在为生存而奋斗。

实用化的趋同还不至于学校管理,对学生的教育也深受浸染。“以学生为中心”并不是由大学包办家庭教育或中小学教育,更不能将片面地理解成迎合学生。学生不会做饭就开设“烹饪课”,不会恋爱就开设“恋爱课”……这样下去大学不仅不能提升水准,学生也会变得趋同而实用。现在,大学里的许多学生都在以“吃货”“打卡王”为时尚,以吃遍天下美食为“理想”,还要打卡世界各地的网红点。这与其说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不如说是大学与社会共同推动的结果。

在实用视角和评价机制下,原本是扭转过度实用化的相关政策也在具体实施中变味。科技部和教育部的破“四唯”“五唯”政策中的破“唯论文”是讲论文要有原创性和质量,但不是说不发论文;实行“代表作制”也不是完全不考虑数量,在同等质量下,数量多者更有竞争力是可以肯定的。但“实用”惯了,对稍微深奥一点的学术评价常识就难以理解,以致争论不休。

而最令人不解的是,破“四唯”“五唯”后,学术评价标准反而留下了最为实用、最易量化的“科研项目”一条,即以科研经费的数量衡量教师和科研人员的水准。这种“唯金钱”论,与公司绩效管理有何差异?前几天,英国利物浦大学以“研究人员的5年平均经费收入”为重要指标解聘该校健康与生命科学学院47名研究人员,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担忧和不满,最后不得不收回成命、公开致歉。此事对于那些以功利和实用态度“与国际接轨”者来说,既有“国际”因素,又有警醒意义,正应了古人那句话“明鉴镜照,理当照其胸怀耳”。

培训机构的培训,看起来是内容各异的,但其实都是在遵循一个原则——实用,大学与之本质的不同就在于追求思维的多样。因此,“去培训化”不是不能兼顾力所能及的社会培训,而是要在教育、教学管理上力戒单一性和实用性,以便让大学替整个社会保留一点超越性、想象力和理想的种子。

由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看大学的「去培训化」